

建国三十年文艺批判极端化发展透析

邹旭林,谭桂林^①

(湖南女子学院 旅游管理系 湖南 长沙 41004)

[摘要] 文章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建国30年的文艺批判事件的极端化表现进行分析,探讨这种极端化现象生成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原因。现代性政治与文化方案之间的对抗和基于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与个体之间的对抗是造成文艺批判极端化发展的两大原因。这种政治性的解读为人们理智审视文艺领域的社会事件和促进文艺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文艺批判; 极端化; 现代性; 对抗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3-0091-05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文艺界频繁发生了一系列批判事件,一批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学作品遭受粗暴打压,如50年代就有三次大的文艺批判,即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开始的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展开的反胡风运动,甚至还包括1960年开始的“文艺反修”斗争、1964年全面展开的“文艺大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批斗。它们并非单纯的文艺批评,而是向极端化方向发展,呈现出共同特点:由最初的文艺批判上升到政治批判,由当初可控状态的文艺事件论为非可控状态下的政治运动。因此,使用“批判”一词似乎比“批评”更合乎历史的真实。本文旨在对这类极端化发展的文艺批判重新进行政治和文化的解读,以便能还原历史真相和为今后文艺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极端化: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转型

现代性是使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东西,包括现代社会的结构组织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这些维度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和跟进的关系,并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不断转型来实现。“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1]在转型过程中,现代性往往表现出诸种特征:普遍性、批判性和断裂性。由于具体社会状况不一,各特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和实现方式的差异,或者是社会采取渐进的温和的方式完成转型,或者是采取突进的极端的方式完成转型。以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为例,由于中西文明的激烈交汇,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急需解决的两大现代性问题,这一宏伟的解放景观迫使人们急于在较短时间对传统和自身展开反思和批判,尽快

建立起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普遍价值基础,因而近现代中国社会必然采取突进的极端的方式来实现现代性转型。最明显的事实是它普遍地制造“断裂”,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层面的断裂。有论者指出“断裂”在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彻底,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其次是变迁的范围,再次是断裂成为中国现代制度固有的特性^{[2]272}。对此,人们自然地联想到与“断裂”相关的词“革命”和“战争”。这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特色所在,自然也渗透到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我们称之为“极端化”。50至70年代,文艺领域的“极端化”先表现为极左主义文化思潮及历次批判运动,后表现为文艺反修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批斗。

文艺批判极端化发展的具体表现

建国30年文艺批判的极端化表现是融合了强烈政党政治色彩的集团化的社会事件,即是由政治权力中心人物发动的和文艺界权威人物积极配合的有组织、有策略的批判运动:首先,重大文艺批判往往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参与甚至亲自发动,由重要文人来积极响应;其次,文艺的界限总是被轻易突破,文艺批判升级为大范围的政治批判运动;再次,文艺批判宣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反动思想以及反革命势力;最后,历次文艺批判总是以被批判对象的政治表态甚至遭受身心摧残的代价来结束。因此可以说,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判,而是典型的政治批判。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艺

[收稿日期] 2011-03-17

[作者简介] 邹旭林(1972-),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女子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艺思想批判运动,旨在肃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附上短评《共产党员应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武训传》的编导演者、赞扬者及武训的扮演者不得不做出深刻检讨,当时凡是观看过《武训传》的共产党员都纷纷检讨和反省。时任上海文化局局长的夏衍作为主管领导也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检讨,田汉、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均作了自我批评。

1954年展开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由山东大学刚毕业的两名学生撰写文章予以批评,属于纯学术争论,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56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紧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1955年展开的反胡风运动影响更深远。胡风与某些左翼重要作家的笔战始于30年代左联时期,恩怨也积结至建国初期。林默涵、何其芳综合多方批评意见写下《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发表在《文艺报》上,作为建国初期对胡风文艺思想批评的总结。作为回应,1954年7月胡风将“三十万言意见书”上呈中央最高领导,集中反驳了林、何二人的观点,包括五把“理论刀子”和宗派主义做法,“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在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会议上,胡风2次积极发言,要攻倒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不料反倒引火烧身。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下序言和按语,断言“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一场文艺批判便升级为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运动。

“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的情况下出现的,是毛泽东后期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批判的重心。从1957年提出防止修正主义危险开始,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分析了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在确立阶级斗争基本路线之后对文艺工作作出了“两个批示”,批评文艺“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告诫大家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反修”主题日益突出。而以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为契机的“革命文艺大批判”是“反修”斗争的延续和逻辑发展,“文艺黑线专政”理论成为康生、江青等人发动“文革”的舆论工具。这一场“革命文艺大批判”既包括对“修正主义”文艺观的批判,又包括对所谓“毒草”的批判。先后被批为“大毒草”的有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孟超改编的昆曲《李慧娘》、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

家铺子》、《红日》等,还包括“文革”期间“四人帮”对电影《清宫秘史》、《创业》、《海霞》、湘剧《园丁之歌》、晋剧《三上桃峰》等的批判。这些批判是江青等人发明的“政治索隐法”的应用,那就是从作品的背景、题材、情节、人物、冲突、语言、场面等各方面来与现实政治进行强行扭结,附会上鲜明的政治寓意。“写失意者必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写犯上者必是攻击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写请命者必代表了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的愿望,写傲骨者必是歌颂反动阶级的反革命气节和斗志等等”^[3]。

这些文艺批判是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极端化方式的体现,是当时政治和文艺领导集团内左倾思潮极端发展的结果,那就是错误地估计文艺战线的形势,把文艺上的争论轻易看成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与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看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些极端化方式给大批作家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身心摧残,例如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底正式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包括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的为23人^[4]。

文艺批判极端化发展的原因

透视建国30年文艺批判的极端化表现,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恐吓、暴力、侵略、战争、种族灭绝等人类文明中的野蛮行径,尽管我们不能将上述文艺批判等同于野蛮行为本身,因为所有的文艺批判发生的载体毕竟是文艺,所针对的目标是文艺群体和个人的思想文化领域,而不是以人身伤害为直接目标,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依然可以借“野蛮化”来类比“极端化”。因为从效果上看二者都是文明的破坏性行为,产生负值效应。“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们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批判性行为甚至是破坏性行为”^[5]。不过,极端化力量并非与积极的建设行为绝然对立,而是统一于人类文明进程之中,在当代社会,统一于现代性进程之中。客观地讲,极端化方式通过不断批判、否定甚至毁灭来促使正面的建设行为部分地实现清除、纠正或弥补的功能。因此,对于20世纪中国而言,“极端化”是完成现代性转型的重要一极,它之所以得以流行是因为背后存在重要原因。

首先,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方案不断问题化是文艺批判极端化发展的重要原因。新中国的建立使得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想象”成为现实^[6]。新的政治权力实体努力推行着一种崭新的现代规划即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包括独特的意识形态设计和制度设计。这种方案,笔者姑且称之为“人民伦理本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与文化方案”。它与欧美流行的个人伦理本位的文化政治方案和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本位文化政治形态明显不同,构成了“断裂”,形成对抗,并表现为自身不断被问题化。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艺批判,就是这种现代性方案问题化的体现,它具体显现为“文学规范的争执”。50年代初,作为对新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密切跟进,主流文学的规范已经十分清晰:文艺为政治服务,社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理想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它的题材,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它的表现对象,文学的真实性是它的核心理论。其中两个方面最为关键,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二是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文艺从属并服务于政治是当时的一个铁定法则,它的实际做法和成效却引起文艺工作者的不满和质疑,甚至包括周扬,也不得不试图在理论上协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50年代,他多次公开宣扬毛泽东文艺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文艺路线就是文艺上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7]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要正确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如他将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文艺工作者以及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错误地了解了文艺服从政治的正确关系和真正意义”,^[8]或者是“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9]²⁴²。郭小川在会议上也如此批评党管文艺“文艺领导犯了一般化的毛病,一般化就是简单化,因为它看不清艺术的规律。这几年就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没搞好……党的小组会、支部会也谈文学作品、批评作品,是否合适?……一般的文学作品,党的会议可不必谈,党不必引导,不必组织这样的活动,除非有严重的政治问题。”^[10]这说明:当时文艺界有识之士确实意识到了政党政治及其思想领导与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简单地以行政与组织方式来规定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创作任务和艺术水准,是违背艺术规律的。

文艺的真实性也是被反复问题化的论题,甚至构成了1956年至1957年文艺思潮的主要问题。阿垅的《论倾向性》、胡风的“意见书”、冯雪峰的《关于创作和批评》、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都强调文艺的真实性这一根本命题。当时文艺的“真实”被设定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下的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统一,是在一种“进步”的世界观指导下的生活实践的体现。毛泽东的《实践论》肯定了生活实践的首要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生活”也具有实践的本体意味,都是特指“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冯雪峰的话来讲,就是指反映了“生活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社会性的革命政治生活^[11]。因而“真实性”是等同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政治原则。对“真实性”的质疑,就是要将文学从政治的过度干预和控制中摆脱出来,将其置于现实主义文艺的最重要的普遍规律及美学本质的地位,是力图化解文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的一种策略。他们如此表达着诉求“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没有真实,便没有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不能离开艺术的真实而存在的。”^[12]周扬也多次强调“真实性”问题,实际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极左倾向的补救。在他看来,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真实性”的死敌,具体地表现为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要克服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关键就在于提高作家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9]²⁴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真实”^[13]。

不过,这些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真实性”的具体内涵和达到“真实”的途径,周扬、茅盾、冯雪峰等采取了一种“中庸”立场来阐述命题,如周扬始终在文艺与政治、政策性与真实性的夹缝中间游走,“正确地表现政策和真实地描写生活两者必须完全统一起来。而生活描写的真实性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原则。”^[9]²⁴³更具危险的是,当这种质疑遭遇集权主义体制时,就变得极为脆弱,往往被视作新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反动,因而招致严厉的批判。政治和文艺领导集团内形成的极左思潮实质就是要努力捍卫“人民伦理本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与文化方案”,清除一切敌对势力和潜在威胁。相应地,“历史唯心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阶级投降主义”、“个人苦行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等是文艺批判运动中频繁出现的政治语汇,折射出文学规范问题化背后存在的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也不断被问题化的事实。在当时普遍的革命政治思维模式下,这些“异端”自然被视为离经叛道,被采取极端化的方式进行“教育”、“批判”甚至“清除”就在情理之中。

第二,中国的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与自由个体的对抗,是文艺批判极端化发展的深层原因。有学者认为:断裂性是现代性的起源和历史存在方式,但它也是一种双向运动,“不管是中国的社会历史,还是文学的历史,都不是简单的断裂,而是断裂与弥合的双向运动。”^[2]²⁷³可以说,现代性的“断裂”既表明了一种激进的历史冲动,又以不断的反思和批判来弥合现代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裂隙。因此,历史传统的连续性,与它的断裂性一样,应被置于与当代性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在历史传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之间,或者说在现代性的弥合和断裂运动之间,产生了对抗性张力。这种对抗往往让人感到社会秩序的专横与暴虐,因而产生了矛盾、抵触情绪甚至暴力倾向。

近现代中国虽然采取了与传统决裂和向西方跟进的文化姿态来迈向现代性社会,但是,历史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依然根深蒂固,譬如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就始终盘踞于现代中国的文化内核。家庭和家族,始终居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地位,家庭的放大就是国家,家庭的伦理秩序可以推而及至国家。林语堂有云“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14]梁漱溟对比中西文化传统时指出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特质“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和团体这两端。”^[15]⁷⁰并引述他人观点来指出中国的文化特色“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轻个人,故欧西之自由主义遂莫能彰,后国家,故近代之国家主义遂非所夙习……是以家族本位为中国社会特色之一。”^[15]¹⁵事实上,中国的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造成了两大紧密联系的后果:一是在个体意义上倾向于消灭自由和权利等观念和实践,二是在国家层面上易于阻碍现代民主体制的建立。这种文化传统往往以丧失个体自由为代价,成为极端化表现的温床。在此一条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极端化或者说野蛮化的对抗法则清晰可见:先于个体存在的家族或国家的利益及力

量被优先保护和发展,异于整体和全局的思想观念及个体行为被优先整合或者清除。这样,20世纪50年代初对胡适派文人的批判否定了“五四”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1955年对胡风及相关文人的批判将20世纪30至4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内部所谓的反对派清除出文坛,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剥夺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权利,20世纪60年代初江青在文艺领域的崛起及周扬的退位则彻底割断了整个新文学的传统,“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批斗则是封建法西斯势力的极端化宣泄,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

进一步分析,文艺批判之所以极端化是因为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实现了两个转换:一是伴随着自由与权利等观念的丧失而来的是家庭和家族的权威直接转换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权威;二是伴随着现代民主观念和体制的破损而来的是家庭和家族的专制体制直接转换为国家制度。确实,新中国轻易地实现了这种转换,毛泽东成为不可撼动的政治权威人物,个人的意志轻易转换为整个社会和政党的意志,无须经过集体商议和表决。在他的领导下,周扬、茅盾、郭沫若、江青等少数人成为文艺界权威人物,他们一同拥有了对文艺界发号施令的权力。事实上,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发动者。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它的导火索是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由江青和张春桥直接授意而成,并由毛泽东审定后才发表,1966年2月江青以林彪的名义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包含“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等十条内容,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定稿,并经过毛泽东修改完成,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五·一六通知》也是经过了毛泽东修改,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与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作用不可替代,她以在毛泽东家庭中的特殊身份进入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使得文化大革命自开始就染上了浓厚的家庭伦理色彩,是对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的最佳注脚。以她为首的“四人帮”采取极端化方式,彻底否定现代性方案的普遍性成分,在文化上重新建立现代集体边界,甚至不惜采取文艺批斗。于是,大批文艺家被批斗、劳改和监禁,甚至被折磨致死。包括老舍、邵荃麟、巴人、邓拓、傅雷、赵树理、田汉、吴晗、杨朔、闻捷、魏金枝、陈翔鹤、肖也牧、海默等人先后殉难,周扬也被打成“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和祖师爷”和一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反革命两面派”,被关进监狱。

综上所述,现代性政治和文化方案之间的对抗、基于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与个体之间的对抗是建国30年文艺批判极端化的深层原因,并构成两大动力机制。不过,前者并非最根本原因,因为在建立现代社会普遍价值基础的同时,现代性政治和文化方案就面临诸多问题,极端化并非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唯一和最佳的途径,相比之下,中国的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及与个体的对抗深层而直接地造成了极端化

行径的流行,与前者互为表里。因为中国的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政教思想体系为内核的,二者结合后衍生出了一种政治乌托邦的集权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乌托邦,那么“无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乌托邦,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其根源在于,在实现由世俗秩序到超越秩序的过程中,个人始终被消融在家庭、家族和国家之中,“集体优先”及扩展后的“天下优先”或“国家优先”的原则根深蒂固,政治领域被神圣化为合法领域。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儒教礼制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被界定和视为试图维护宇宙和谐的主要场所”^{[16]279},“……其政治领域被神圣化为实现流行的超越图景的主要的、几乎唯一的领域”^{[16]272}。于是,中国的文化结构始终被镶嵌于政治结构之中,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往往成为政治人格的一种变体。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家庭伦理本位文化传统中个人自由与权利以及现代民主观念和制度难以付诸实际。对此,西方学者深刻指出“以一种现代的集权主义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再现了古代帝国的某些传统特征,其途径是通过以下二者的结合:一方面是政治领域的神圣化,帝国被视为中央之国,是实现其强烈的现世的超越图景的领域;一方面是文人官僚统治阶级的产生,这一阶级宣传一种社会宇宙论图景,并且将边缘进入区别于文化中心的政治中心的自主权力最小化。”^{[16]282}这一说法非常适合建国30年的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 [1]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绪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3.
- [2] 陈晓明. 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M]// 杨春时, 俞兆平.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3] 黄曼君. 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1146.
- [4] 李辉.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3.
- [5] 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275.
- [6] 李欧梵. 未完成的现代性[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
- [7] 周扬. 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M]//周扬文集(2).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53.
- [8] 周扬.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M]//周扬文集(2).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149.
- [9] 周扬.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M]//周扬文集(2).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10] 郭小川. 郭小川1957年日记[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53-54.
- [11] 冯雪峰. 冯雪峰论文集(下)[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12.

- [12] 陈涌. 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J]. 人民文学, 1956(10): 36.
- [13] 周扬. 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M]//周扬文集(2).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217.
- [14]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9.
- [15]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6] [以色列]S. N. 艾森斯塔特. 反思现代性[M]. 旷新年, 王爱松,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Penetrating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after Liberation to the Extremalization of Literary Critics

ZOU Xu-lin ,TAN Gui-lin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04 , China)

Abstract: While penetrating the extremalization to literary critical events of 30 years after liberation from two aspect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 this paper further disclose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asons concealing behind this phenomenon of the extremalization. The two confrontations , one between different moder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ases , the other between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departmental selfishness based on Chinese family ethics and individuals , mainly contribute to the extremalized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s. This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provides us with some important insights to rationally examine the social events in the area of literary critics , and also to enhanc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s.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s; extremalization; modernity; confrontation

(上接第 74 页)

- [5] 邱美玲. 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及其对策[J].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2(2): 16-20.
- [6] 李心天. 你的服务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1): 63-64.
- [7] 宋海燕. 健美操对女大学生人格特征影响的实验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32-33.
- [8] 胡仕勇, 康恒元. 大学生闲暇生活行为倾向研究[J]. 当代青年研究 2001(4): 35-39.
- [9] 黄玉山, 陈南生, 陈宝玲等. 中国大学生健康状态与生活行为的调查研究[J]. 体育学刊 2008(5): 72-76.

Analysis on the Health Interventions towa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Impediments

FU W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 Hengyang 421001 , 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 as the well-educated group , bear the heavy burden of the history. Nowadays , though the idea of "Health comes the first" has penetrated into our lives , more and more college students are confronted with puzzles from study , employment , communication and competition , which make them the most fragile group with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erefore , the scientific health interventions towa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impediments can not only guarantee their growth , but also impel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ject and the innovation of its public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impediment; health; intervention; analysis